

回應李鈞鵬 〈作為社會科學哲學的社會機制〉

萬毓澤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本文是對李鈞鵬〈作為社會科學哲學的社會機制〉一文的批判性回應。本文充分肯定〈李文〉對華語社會科學界的貢獻，但也指出〈李文〉的幾項主要缺失：(1)混淆“社會機制”與“機制式解釋”；(2)未能清楚說明涵蓋律模式與機制式解釋的關係；(3)未能清楚界定“機制”與“社會機制”。其中又以第三項缺失最為嚴重，因為它妨礙了讀者理解“什麼樣的解釋才能算是以社會機制為基礎的解釋”。本文認為，由於〈李文〉未與多數機制取徑文獻進行對話，因此一方面忽略了重要的（社會）科學哲學問題（如實在論與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的區別、不同理論立場對因果性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機制取徑所反映的不同科學哲學立場），一方面低估了不同機制取徑的歧異可能衍生的後果。本文希望藉由回應〈李文〉，進一步澄清機制式解釋中的關鍵概念，並讓華語社會科學界更加熟悉國際學術界的研究動態。

李鈞鵬在本刊14卷2期發表的〈作為社會科學哲學的社會機制〉一文（以下簡稱〈李文〉），從Charles Tilly式的角度，以社會科學的許多經驗研究為例，言簡意賅地闡述了“社會機制”這個概念在社會科學哲學與方法論當中的地位。¹〈李文〉的重要性在於，“機制式解釋”確實是十餘年來國際學術社群（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極為關注的主題，且如〈李文〉所言，已有部



分論者將之視為一場新興的“運動”² 但華語學界的討論仍相當不足，因此我們樂見〈李文〉有此嘗試。

〈李文〉承認國際學術界對“機制式解釋”的看法“遠未達成共識”（頁360），但它希望異中求同，在不同理論立場之間梳理出某些共通的基本特徵。雖然這種寫作策略有充分的正當性，但卻可能低估理論立場的歧異所衍生的重大後果。我認為，社會科學哲學/方法論研究者的重要任務，恰恰是在表面的一致之下挖掘出潛在的衝突，並解讀其科學哲學/方法論上的意涵。機制式解釋及其引發的爭議就是一個很適合這麼做的題目。

〈李文〉由於未能處理這點，因此在列舉機制式解釋的多項基本特徵時，出現了某些前後不一致、或難以自圓其說的狀況。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延續〈李文〉的美意，進一步討論機制式解釋在（社會）科學哲學上的基礎，並處理〈李文〉某些可能啟人疑竇、或需要加以澄清的概念與論點。

一 是“社會機制”，還是“機制式解釋”？

〈李文〉將“社會機制”視為一種“解釋手段”（頁361、364），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這類表述方式：“社會機制承認個人、整體、形勢與關係作為研究單位各自的優勢”（頁362）；“社會機制的目標要謙卑（或曰現實）許多”（頁367）；“社會機制所採取的時序性屬於事件性時序性”。

誠如〈李文〉所提及，機制論者是反對經驗主義的（詳後文）；更明確地說，機制論者多半是科學實在論者。從科學實在論的角度來看，“機制”是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中真實存在的事物或過程（關於“機制”的界定方式，亦詳後文），而對“機制”的描述可以有不只一種，就好比同一個地域可以用不同的地



圖（例如使用不同的比例尺、符號等等）來呈現。重點是：這個世界（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不應該被等同於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經驗與知識。兩者必須嚴格區分開來。

因此，〈李文〉的表述方式把“（真實的）機制”和“真實機制的模型或關於真實機制的理論”³混淆在一起，這是違反實在論的基本主張的。⁴我建議以“機制式解釋”（相應的英文包括：mechanism-based explanation、mechanistic explanation、mechanismic explanation）⁵來取代〈李文〉所謂的“社會機制”，這樣可使語意更為清晰明確。（事實上，〈李文〉偶爾也使用類似的表述方式，諸如“基於社會機制的解釋”、“社會機制解釋”（頁374）、“基於機制的分析”等（頁376），只是未能一貫。）

二 “機制式解釋”對立于涵蓋律模式嗎？

〈李文〉主張，機制式解釋是對涵蓋律模式的“直接挑戰”。誠如〈李文〉指出，涵蓋律模式（乃至納入了機率概念的歸納—統計模式）是以經驗主義的本體論為基礎，將因果關係理解為經驗規律性（empirical regularities）或事件與事件的恆常相連（constant conjunctions），從而沒有“指明真正的因果機制”（頁367）。〈李文〉所列舉的涵蓋律解釋的例子，是（每天堅持慢跑三十分鐘有助於減肥 & 我上個月堅持每天慢跑三十分鐘 ∴ 我這個月的體重輕於一個月以前的體重）。但〈李文〉的討論至少有兩個問題：

- (1) 〈李文〉在批評這種涵蓋律模式時，其中一項理由是“我這個月的體重未必輕於一個月以前的體重”（頁368）。但這種批評是無效的，因為假使我這個月的體重沒有輕於一個月以前的體重，那麼被解釋項就不會是“我這個月的體重輕於



一個月以前的體重”。涵蓋律模式的重點在於：解釋與預測是一體兩面，如果被解釋項是已知的事實，那麼這個論證就是解釋；如果被解釋項是未知的，這個論證就成了預測。因此，如果“我這個月的體重輕於一個月以前的體重”是已知的事實，那麼這個涵蓋律模式就是有效的；如果是未知的，則是預測，而預測若有誤，則必須回頭去修正律則。

- (2) 〈李文〉接下來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機制式解釋和涵蓋律解釋的不同：（慢跑有助於消耗體內多餘熱量，從而有助於減少體內脂肪，從而每天堅持慢跑三十分鐘有助於減肥 & 我上個月堅持每天慢跑三十分鐘 ∴ 我這個月的體重輕於一個月以前的體重）。但這個例子的邏輯形式與涵蓋律模式並無任何差異，它只是在律則的部分加入了機制的概念（慢跑可以消耗熱量、減少體脂肪）。換言之，機制式解釋並不真的對立於涵蓋律模式，而毋寧是對後者的補充與完善。Mario Bunge 便指出，機制式解釋在邏輯形式上是與涵蓋律模式一致的；涵蓋律模式的問題在於它只注意到科學解釋的邏輯層面，卻忽略其本體論（即世界中真實的運作機制）的層面（這與邏輯實證論者激烈反對一切形上學有關）。因此，涵蓋律模式雖然是正確的，但卻是不完整的。據此，Bunge 建議將涵蓋律模式修改為：（可以檢驗的、以機制為基礎的假說或理論 & 初始狀況 ∴ 被解釋項）。⁶

三 究竟什麼是“機制”：實在論者的挑戰

如論者所指出，晚近高舉“機制”這面旗幟的社會科學家，可謂形形色色，至少包括了“方法論個體主義者、批判實在論者、Robert Merton 的追隨者、Pierre Bourdieu 的追隨者、⁷ 馬克思



主義者、Jon Elster的追隨者等等”⁸（當然，我們至少可以再加上Charles Tilly的追隨者）。但不免讓人困惑的是，雖然這些學者一致使用“機制”這個用語，但究竟“機制”所指為何，卻似乎莫衷一是。⁹那麼，〈李文〉提供了什麼答案或線索呢？

這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問題，但〈李文〉的討論卻失之粗略，甚至前後矛盾，殊為可惜。首先，從〈李文〉中，我們得知“社會機制”式的解釋模式有以下的優勢：

- (1) 在認識論和本體論上維持平衡，承認個體、整體、形勢與關係各自具有的優勢，試圖達成從宏觀結構到微觀互動的多重層次的系統解釋（頁362-3）；
- (2) 可以增強高一級理論的精確性、複雜性以及優雅性（頁370）；
- (3) 將時序性引入社會科學研究（頁374）。

這些說法不能說錯，但由於〈李文〉始終未為“社會機制”提供一個清楚的定義，因此，我們只知道“社會機制”式的研究有許多優勢，但卻不曉得究竟該如何進行“社會機制”式的研究。〈李文〉雖然提供了不少機制式解釋的例子（如經濟成長透過哪些機制影響民主制度、知識分子意識如何形成等），但仍然幫助有限，因為〈李文〉始終沒有說明：(1) 哪些因素才能算是“機制”；(2) 哪些機制才能算是“社會”機制。

本節先處理第一個問題。〈李文〉認為社會機制是“因果機制”，並進一步區分出四種“因果解釋機制”：(1) 事件—事件；(2) 事實—事件；(3) 事件—事實；(4) 事實—事實。〈李文〉宣稱，除了極少數例外（哪些例外？），所有因果解釋都可以歸類為這四種（頁365）。

但問題是，當前提倡機制式解釋的科學哲學家，有許多恰恰認為：以機制為基礎的解釋必須超越事件（或事實）之間的關係，以探討這樣的關係背後的“因果結構”。實在論者，乃至



後文將進一步闡釋的兩大機制取徑（“機制—系統取徑”及“分析社會學”取徑），都反對簡單從事件或事態的角度來理解機制（式解釋）。

如前文所提及，〈李文〉在批判涵蓋律模式時，曾正確指出，涵蓋律模式建立在經驗主義的本體論之上，並將“實在化約為事件與經驗觀察”（頁367）。的確，機制論者是不接受“世界是表象的總和”（*die Welt ist eine Summe von Erscheinungen*，借用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的用語）這種看法的。機制論者多半主張某種超越經驗主義的本體論，唯有如此，方能充分認識到實在的複雜性；或者，照批判實在論先驅人物Roy Bhaskar的古典說法，正因為這個世界是層級化（stratified）的，科學才得以成為可能。¹⁰換言之，既然實在從來就不是只由事件構成，因果關係/因果解釋也就不會/不能只是找出事件與事件之間的聯繫。

的確，從某類實在論的科學哲學立場來看，¹¹事件（即事態的變化）確實可以被視為亞里斯多德所謂的“動力因”（efficient cause），亦即擁有特定的因果作用力（causal powers；科學哲學家Nancy Cartwright使用的語彙則是capacities），能夠生產（produce；generate）出變化。¹²然而，

- (1) 從Rom Harré、E. H. Madden、Charles Varela等（非Bhaskar傳統下的）批判實在論者的角度來看，能夠被視為“動力因”的，還包括那些擁有因果作用力的實體（entity），亦即所謂的“具有力量的特殊物”（powerful particular）；而在社會世界中，最重要的“具有力量的特殊物”就是行動者，包括個體行動者和複合行動者（composite actors）。複合行動者的特徵是“能夠在個體的層次之上採取意向性的行動”，¹³且通常具有某種制度結構，讓內部的個體（或其他較低層次¹⁴的複合行動者）在其中互動，以協調集體的行動。複合行動



者又可以進一步區分為“集體行動者”（其運作取決於其成員的偏好、且受其偏好引導，如聯盟、社會運動、俱樂部、協會等）和James Coleman所謂的“法人行動者”（規模與權力較大、壽命較長，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內部具有高度分化的角色與位置網絡，且通常有正式的決策規則，如企業、工會、政府機構）。¹⁵

- (2) 而對許多實在論者來說，這些實體之所以具有（突現的）因果作用力，恰恰是因為這些實體的組成成分（各自又有其特定的因果作用力）在特定的相互關係下有所互動，因而形成了某些“機制”。¹⁶ 換言之，“機制”是用來解釋一個實體所具有的（突現）因果作用力的解釋項。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提供比較完整的因果解釋，就不能只把因果關係安置在事件的層次上（經驗或表存層次）。黑格爾曾說“凡是實在的，便能起作用”（*Was wirklich ist, kann wirken*），¹⁷ 而批判／科學實在論者的看法則是“凡起作用／因果作用力的，就是實在的”（*Was wirkt, ist wirklich*）。¹⁸ 機制式解釋的目標，就是找出哪些“實在”（那些不一定可直接觀察的實體、結構、關係、因果作用力與機制）促成了研究者的經驗觀察對象（事件與事態）的生成與（不）變化。¹⁹

以上的討論凸顯了〈李文〉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討論“機制”這個概念時，〈李文〉幾乎沒有與自然與社會科學中最主要的機制論者對話，而是過度仰賴Tilly及其合作者的看法。（但即使如此，〈李文〉也沒有深入討論Tilly等人對“機制”的界定與運用。）〈李文〉從事件的角度來理解“機制”，確實呼應了Tilly、Doug McAdam和Sidney Tarrow在《鬥爭的動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等文獻中對“機制”的界定：“一類有著明確界線的重大事件，它們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以相同或極其相似的方



式，使特定的一組要素之間的關係發生改變”。²⁰ 而機制與機制的組合序列，則是他們所謂的“過程”。

的確，Robert Merton、Mario Bunge都是從“過程”(process)的角度來理解機制。如Merton將“社會機制”界定為“對社會結構的既定部分產生既定影響的社會過程”，而社會學的目標就在於“揭示這些機制是如何產生的”，以及“解釋為什麼在某些社會系統中這些機制無法有效運作或根本沒有出現”；²¹ Bunge則將機制界定為“系統內部各種過程的集合，能夠在整個系統當中帶來或防止變化（出現某種性質，或出現另一種過程）”。就此而言，Tilly的看法似乎很接近Merton與Bunge。（也因此，不少受Bunge影響的社會科學家也傾向於高度評價Tilly的機制觀及其在歷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研究中的應用。²²）由於Merton並未在方法論與科學哲學的層次上完整闡述其機制觀，因此這裡只討論Bunge。要注意的是，身為最重要的機制論者之一，Bunge雖然確實將機制理解為過程的集合，²³ 但要注意的是，Bunge同時也是系統論者，因此，他總是將機制與系統結合在一起考察：

“系統與機制這對概念在現代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生物—社會科學）當中是如此重要，因此，對這對概念的使用孕育出了一整套本體論，亦即我所謂的系統論(systemism)”。²⁴ Bunge的系統論的精髓，在於他提出的成分—環境—結構—機制模型(CESM model)：不論我們要分析的是系統還是機制，都至少要注意到四個層面：(1)該系統由什麼組成（“組成成分”為何）；(2)外部環境為何（“環境”為何）；(3)該系統的組成成分如何聯繫在一起（“結構”為何）；(4)該系統如何運作（“機制”為何）。因此：

系統 = 〈組成成分，環境，結構，機制〉，而

(a) 組成成份 = 系統組成成分的集合。



- (b) 環境 = 系統組成成分以外的事物的集合，可對該系統內部某些（或所有）組成成分起作用，或受其影響；
- (c) 結構 = 系統組成成分之間的關係或聯繫（內部結構）；或該系統組成成分與環境的組成成分之間的關係或聯繫（外部結構）；
- (d) 機制 = 在系統內部，使系統運作、變化或阻礙變化的各種過程的集合。

據此，若要研究某一類機制，則必須(1)揭示（或猜想）系統的組成、內外部結構、與環境的聯繫，並(2)揭示（或提出假說）系統的組成成分進行哪些活動（執行哪些功能）、如何進行（特定機制為何）。²⁵ 因此，Bunge與Tilly等人最大的差異在於：當Bunge主張機制式解釋時，他指的不只是運用機制這個概念，而毋寧是運用整個CESM模型。²⁶ 再者，對Bunge等科學實在論者而言，絕大多數的機制都是無法直接觀察的（如擺鐘的運作機制便包含某些無法觀察的對象，如引力場和慣性；如工廠的協調運作機制也無法直接觀察，研究者只能直接觀察工廠的某些組成成分，如員工、建築物、機械、原料等），因此研究者必須透過“猜想”（conjecture）來提出機制，但“猜想”當然不是天馬行空，而是受到資料（如廣受科學社群承認的成熟假說、數學概念等）的啟發與約束。²⁷ 雖然Tilly也是實在論者，²⁸ 但當他從事件的角度來理解機制時，顯然沒有考慮到，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如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²⁹）最重要的差異之一，恰恰在於前者肯定那些無法直接觀察的理論存有物（theoretical entities，包括這裡討論的因果機制、因果作用力等）具有真實的本體論地位。³⁰

〈李文〉承襲自Tilly的機制觀，除了未能與上文討論的Bunge的取徑對話外，也幾乎完全沒有處理當前學界（我所認為的）兩大最重要的機制取徑：自然科學界（主要來自於生命科學）的



“機制—系統取徑” (mechanistic systems approach)，以及社會科學界的“分析社會學” (analytical sociology) 取徑。這兩種取徑都認識到事件與過程的重要性，但也都認識到“機制”式解釋不能只聚焦於事件和過程，而是要仔細將 Chares Demetriou 所謂的“實體與活動的互動” (entity-activity interplay) 加以概念化。³¹ 在 Bunge 那裡，“實體與活動的互動”指的是系統、系統組成成分、運作機制之間的關係；在“機制—系統取徑”那裡，則可以將 Peter Machamer、Lindley Darden、Carl F. Craver 三人廣受引用的機制定義當作代表：“機制是由實體 (entities) 和活動 (activities) 所組成，這種組成的方式使其產生由起點到終點、或由初始條件到終止條件的規律性變化”。³²

Carl Craver 等“機制—系統取徑”的代表人物皆認為，機制式解釋是一種構成性 (constitutive) 的解釋模式：即根據系統的組成實體 (component entities) 及其活動的組織模式 (organization) 來解釋現象。³³ (之所以稱為“構成性”的解釋，是因為機制是系統的組成成分在相互聯繫與一定條件下所執行的活動，因此只要談及“機制”，勢必觸及“部分—整體”的關係。) 因此，Stuart Glennan 把這類機制哲學稱為“機制—系統取徑”。³⁴ 分析社會學的幾位代表人物也採納了類似的立場，主張機制是由“實體（及其性質）以及這些實體（自己或與其他實體一起）進行的活動”所構成。³⁵ 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採用的語彙與 Bunge 有異，其中最重要的差異是 Bunge 把這些“實體”稱為“系統（的組成成分）”，但背後的理路是一致的：機制式解釋必須優先考量的是具有因果作用力的實體、它們的相互聯繫以及活動。Gianluca Manzo 說得言簡意賅：“既然任何‘事件’或‘過程’最終皆指涉實體及活動……那麼，一個將焦點擺在實體/性質/活動的定義，就會比一個泛泛地指涉‘事件’或‘過程’這類概念的定義來得準確”。³⁶



值得注意的是，在承受多年的批評後，Doug McAdam 與 Sidney Tarrow 在 2011 年的文章中回應：“我們現在認為，我們對‘事件’這個詞的用法是使人困惑的，因為這可能會讓許多讀者假定我們討論的是‘發生的事情’(occurrences)，而不是驅動這些事情的機制”。³⁷ 我想，這應該足以構成以 Tilly 為主要參照點的〈李文〉重新提煉“機制”這個概念的基礎。

四 “社會”機制的邊界

再看另一個問題：究竟什麼是“社會”機制？由於〈李文〉是從解釋手段或方法論的角度來使用“社會機制”這個詞（見本文第一節），因此並沒有從社會本體論的角度釐清哪些機制可以歸類為社會機制，以及該如何區分不同層次的社會機制。也因為如此，〈李文〉出現了一些讓人困惑的文句，比如說，〈李文〉甚至將“慢跑有助於消耗體內多餘熱量，從而有助於減少體內脂肪”也稱為“社會機制”（頁368）。

〈李文〉主張宏觀的社會機制是存在的，但〈李文〉的理由卻只是“更多的學者否認社會機制只能適用於個人層面的觀點”（頁370）。對此，我有兩點評論：

- (1) 以學者人數多寡來評斷理論立場的優劣，並不是有效的論證。當許多機制論者（其中一部份是前文提及的分析社會學者）皆否認或懷疑宏觀社會機制的存在時，³⁸ 我們更關心的，是該如何回應他們的論點。
- (2) 這些學者之所以否認或懷疑宏觀社會機制，並不是〈李文〉所說的“社會機制的內在邏輯要求方法論個人主義”（頁370）如此簡化（所謂的“內在邏輯”是什麼？）。以下分三點來談：(a) “方法論個體（人）主義”因為指涉過於混



亂紛雜，因此不是一個好的標籤。分析社會學者（為行文方便，我將這一類學者等同於分析社會學者）自己習慣採用的說法是“結構個體主義”（structural individualism），因為這種方法論立場相當強調社會結構在因果解釋上的重要性：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關係、社會網絡不僅是被解釋項，更是解釋項的一部份。³⁹之所以將“個體主義”保留下來，是因為他們認為個體行動者是社會世界中最基本的“因果作用者”（causal agent），因此，在為因果解釋提供微觀基礎（microfoundations）時，必須將Boudon-Coleman圖式中三種最主要的社會機制（從宏觀到微觀的情境機制、微觀的行動形成機制、從微觀到宏觀的轉化機制）聯繫至個人行動的原因及結果。⁴¹ (b) 儘管部分學者主張提供個體層次的微觀基礎（即所謂個體主義），但這不表示他們必然主張“個人意識的形成……受到對個人效用最大化追求的驅動和制約”（〈李文〉，頁363），因為他們完全可以採用不同的行動理論：除了惡名昭彰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以外，遊戲人（*homo ludens*）、創造人（*homo creativus*）、評價人（*homo aestimans*）、情緒人（*homo emotionalis*）乃至互惠人（*homo reciprocans*）等等都是可能的發展方向。⁴² 即使是Jon Elster這樣最極端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者，或多年來不斷標舉方法論個體主義立場的Raymond Boudon，也從未臣服於預期效用理論。⁴³ (c) 部分分析社會學者之所以否認或懷疑宏觀社會機制的本體論地位，是因為當研究者過於輕率地訴諸宏觀社會機制時，這些機制很可能只是一些可疑的集體概念（*Kollektivbegriffe*，借用韋伯語），實際上根本不具因果作用力。⁴⁴

〈李文〉還引用了Tilly所區分的環境機制、認知機制和關係機制，來論證機制式解釋具有不同的層次（頁370-71）。這是很



值得深究的課題，但很可惜的是，〈李文〉並沒有從（社會）本體論的角度闡釋“層次”的概念；⁴⁵ 因此，舉例來說，我們便很難理解〈李文〉引述的“短期關鍵事件”、“內在結構變動”、“正式組織的推動”（頁370）在什麼意義上屬於不同層次的社會機制。事實上，雖然我完全同意微觀基礎在因果解釋中的重要性，但我同時也主張有宏觀（超越個體的）社會機制的存在。此外，雖然我不盡同意Tilly的以“事件”為基礎的機制觀，但我認為他對環境機制、認知機制、關係機制的區分是合理的，儘管環境機制（如Tilly曾討論過的資源耗竭、旱災等等）不見得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機制”（由社會系統內的個體行動者或複合行動者在一定相互關係下互動而成的社會過程）。因此，以上的討論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邀請〈李文〉作者一同來回應質疑、深化討論。⁴⁶

五 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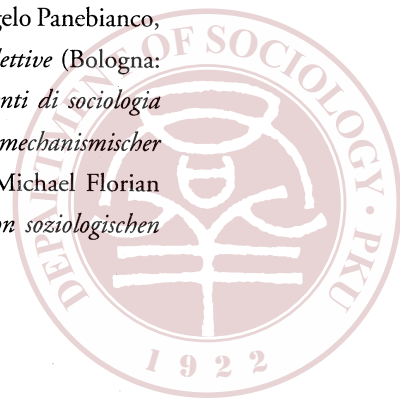
本文充分肯定〈李文〉對華語社會科學界的貢獻，但也指出〈李文〉的幾項主要缺失：(1)混淆“社會機制”與“機制式解釋”；(2)未能清楚說明涵蓋律模式與機制式解釋的關係；(3)未能清楚界定“機制”與“社會機制”。其中又以第三項缺失最為嚴重，因為它妨礙了讀者理解“什麼樣的解釋才能算是以社會機制為基礎的解釋”。本文認為，〈李文〉在未與多數機制取徑文獻對話的情況下，一方面忽略了重要的科學哲學問題（如實在論與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的區別、不同理論立場對因果性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機制取徑所反映的不同科學哲學立場等等），一方面低估了不同機制取徑間的歧異可能衍生的影響。希望透過本文的書寫，能夠讓華語社會科學界更加認識這個國際學術界高度



關注的課題，及其背後潛在的爭議。誠如〈李文〉所言，機制式解釋“已經並將進一步影響社會科學家對其研究方法與理論的思考，而這種影響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頁377）。

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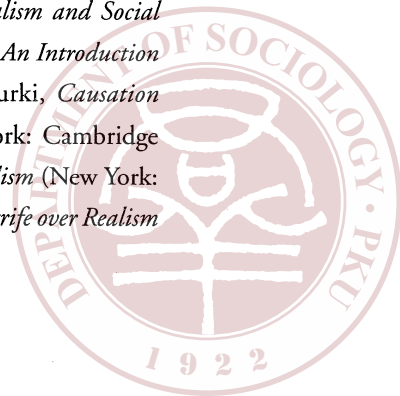
- 1 李鈞鵬，〈作為社會科學哲學的社會機制〉，《社會理論學報》，14卷2期（2011），359–81。
- 2 李鈞鵬在另一篇主題類似的文章中，提到“社會機制在西方，尤其在美國受到了廣泛關注”（見李鈞鵬，〈社會機制：社會科學研究的新理路〉，《中南大學學報》，17卷6期（2011），18）。但事實上，除了美國或英美語系的學術界外，歐洲的學術界也高度關注機制式解釋，像 *Papers: Revista de Sociologia*、*Revista Internacional de Sociologia*、*Soziologische Revue* 等西班牙語、德語的學術期刊近年來都曾策劃機制式解釋的專題，一群歐陸學者也在2008年成立了歐洲分析社會學者網絡 (European Network of Analytical Sociologists)，主要目標便是提倡以機制為基礎的理論與經驗研究。晚近相關的社會科學類專書（含英美語系及主要歐語）見 Flaminio Squazzoni, *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s, 2012); Pierre Demeulenaere, ed., *Analyt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Mechanis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Wan, Poe Yu-ze, *Reframing the Social: Emergentist Systemism and Social Theory*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2011); Phyllis McKay Illari, Federica Russo, and Jon Williamson eds, *Causality in the Sci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Thomas Kron and Thomas Grund, eds, *Die Analytische Soziologie in der Diskussion* (Wiesbaden: VS Verlag, 2010); Peter Hedström and Peter Bear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Renate Mayntz, *Sozialwissenschaftliches Erklären. Probleme der Theoriebildung und Methodologie* (Frankfurt/M.: Campus, 2009); Dietrich Rueschemeyer, *Usable Theory: Analytic Tools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Angelo Panebianco, *L'automa e lo spirito. Azioni individuali, istituzioni, imprese collettive* (Bologna: Il Mulino, 2009); Filippo Barbera, *Meccanismi sociali. Elementi di sociologia analitica* (Bologna: Il Mulino, 2004); Michael Schmid, *Die Logik mechanismischer Erklärungen* (Wiesbaden: Vs Verlag, 2006); Marco Schmitt, Michael Florian and Frank Hillebrandt, eds, *Reflexive soziale Mechanismen. Von soziologischen*



- Erklärungen zu sozionischen Modellen* (Wiesbaden: VS Verlag, 2006); Jürgen Mackert, *Ohnmächtiger Staat?: Über die sozialen Mechanismen staatlichen Handelns* (Wiesbaden: VS Verlag, 2006)。
- 3 Peter Hedström, *Dissecting the Social: On the Principles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n.
 - 4 這個問題非〈李文〉所獨有，包括Peter Hedström、Richard Swedberg、Diego Gambetta、Arthur Stinchcombe、Thomas Schelling等機制式解釋的倡議者都（曾經）有類似的主張。請參考以下的討論：Wan, Poe Yu-ze, *Reframing the Social: Emergentist Systemism and Social Theory*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2011), 143。
 - 5 Mario Bunge（以及部分受Bunge影響的學者，如德國社會學者Michael Schmid）從1960年代晚期以來皆使用mechanismic這個詞（另外如美國社會學者Philip Gorski、政治學者John Gerring也都採用之），而主流的英美科學哲學界則較常使用mechanistic這個詞。Bunge之所以不使用mechanistic，是因為這個詞容易讓人有機械論的聯想，但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機制都不是機械性的。見Wan, Poe Yu-ze, *Reframing the Social: Emergentist Systemism and Social Theory*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2011), 144–5。〈李文〉多次引用的William H. Sewell Jr.便傾向於從機械論的角度來理解“機制”這個概念，因此他完全不贊成將社會世界理解為“由一個複雜的機制所構成”，見William H. 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356。另，加拿大著名的（認知）科學哲學家Paul Thagard獨樹一幟地使用mechanista這個術語，見Paul Thagard,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Science: Explanation, Discovery, and Conceptu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2)。
 - 6 見Mario Bunge, *The Sociology-Philosophy Connect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9), 49–51。Peter Hedström對涵蓋律模式（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的批評是(1)放諸四海皆準的社會規律並不存在；(2)容易錯把空泛淺薄的律則及其演繹當成真正的（納入機制概念的）科學解釋；(3)未能正視“行動”及“意向性解釋”在社會科學中的重要性（當然，其背後的社會本體論預設是“只有透過個人和其他人的互動，才能產生我們觀察到的社會規律性”），見Peter Hedström, *Dissecting the Social: On the Principles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20。Bunge修改後的模式可以充分回應這類批評：(1)可以檢驗的、以機制為基礎的假說或理論不需放諸四海皆準，可以限制其適用範圍；(2)以機制為基礎的假說或理論完全可以納入社會行動或行



- 動者的意向，例如 Hedström 提出的“慾望—信念—機會理論” (DBO theory) 就是如此。
- 7 Bourdieu 的重要著作皆大量使用“機制”一詞，見如 Pierre Bourdieu, 《實作理論綱要》，宋偉航譯（台北：麥田，2004）；Pierre Bourdieu, 《實踐感》，蔣梓驊譯（南京：譯林，2003）；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Wacquant, 《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李猛、李康譯（台北：麥田，2008）；Pierre Bourdieu, 《言語意味著什麼：語言交換的經濟》，褚思真、劉暉譯（北京：商務，2005）。在《國家菁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La noblesse d'État. Grandes écoles et esprit de corps*）一書中，Bourdieu 開宗明義即說：“社會學的目的在於揭示構成社會空間的不同社會人群的最深層的結構，以及傾向於確保社會空間的再生產或者變革的‘機制’”，見 Pierre Bourdieu, 《國家菁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楊亞平譯（北京：商務，2004），1。
 - 8 Thomas Brante, “Explanatory and Non-explanatory Goal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8 (2008), 271n.
 - 9 甚至連使用的語彙也不見得一致。如英國批判實在論傳統下的學者（如 Rom Harré、Roy Bhaskar、Andrew Collier、Tony Lawson、Ray Pawson、John Mingers、David S. Byrne、Andrew Sayer）及部分美國學者（如 Thomas J. Fararo、Peter Manicas）、法國學者（如 Mohamed Cherkaoui、Raymond Boudon、Gianluca Manzo）及義大利學者（如 Filippo Barbera）較常使用的概念是“生成機制”（generative mechanism; *mécanisme générateur*; *meccanismo generativo*）；另也有部分社會學者（如英國的 John H. Goldthorpe 及德國的 Renate Mayntz）偏好“生成過程”（generative process）、“因果重建”（kausale Rekonstruktion）等用語。
 - 10 見 Roy Bhaska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1978)。批判實在論者倡議的是一種深度的或層級化的本體論。他們認為，實在可區分為真實（real）、表存（actual）、經驗（empirical）三個層次：真實層次包含各種結構與生成機制；真實層次的結構與機制啟動後所產生的後果，即各種事件與事態，則屬於表存層次；最後，人類所有感知的對象皆屬於經驗層次。關於批判實在論與科學實在論的基本立場及其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可參考如 Andrew Sayer, *Realism and Social Science* (London: Sage, 2000); Andrew Collier, *Critical Re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s Philosophy* (London: Verso, 1994); Milja Kurki,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laiming Causal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Ilkka Niiniluoto, *Critical Scientific Re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ario Bunge, *Chasing Reality: Strife over Re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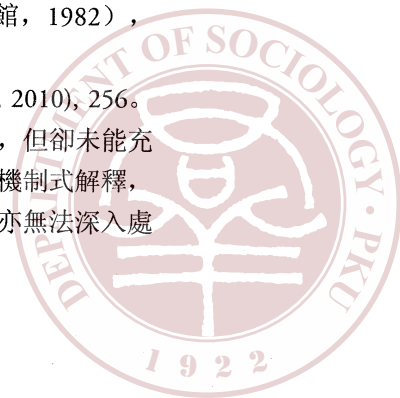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 Michael Devitt, “Scientific Realism,”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eds. Frank Johnson and Michael Smi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767–91; Poe Yu-ze Wan, “(Re-)Problematizing the Luhmannian Constructivist Systems Approach: A Bungean Intervention,” *Current Sociology* 59 (2011), 696–716。另請比較：Isaac Ariail Reed,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Knowledge: On the Use of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11 見如John Dupré and Nancy Cartwright, “Probability and Causality: Why Hume and Indeterminism Don’t Mix,” *Nous* 22 (1988), 521–36。
- 12 當我們說X具有因果作用力，意謂X在適當的條件下能夠做某些事情（從而發揮因果效力），見Rom Harré and Edward. H. Madden, *Causal Powers: A Theory of Natural Necessity* (Oxford: Blackwell, 1975)。但要強調的是，不是所有實在論者都同意將“事件”視為具有因果作用力的本體論實體，例如Harré便主張“事件不具有因果作用力，只有物（things and stuffs）才具有”，見Rom Harré, “The Transcendental Domain of Physics,” in *Constituting Objectivity: Transcendent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 Physics*, eds. Michel Bitbol, Pierre Kerszberg and Jean Petitot (Berlin: Springer, 2009), 151。
- 13 Fritz W. Scharpf, *Games Real Actors Play: Actor-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cy Research*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52.
- 14 以下從Bunge式系統論的角度，簡要說明關於“層次”（level）這個概念的一些主張：（1）“層次”（或“組織層次”，level of organization）可以界定為“一切共同擁有某類特定性質與／或規律的物的集合”，如“原子層次”就是一切原子的集合，“分子層次”就是一切分子的集合。（2）每一個層次的物（系統）都由較低層次的物（系統）組成，並擁有這些組成成分所不具有的突現／系統／全面性質（emergent/systemic/global properties）。（3）在任一種系統（如原子系統、生命系統、家庭系統、學校系統、工廠系統）中，都可區分出兩種層次：宏觀層次與微觀層次。宏觀層次就是該類系統的集合，微觀層次則是該類系統的所有組成成分的集合（且微觀層次可以不只有一種）。（4）這個世界具有層次結構（level structure），而一切存在物可劃歸於至少五個層次：物理、化學、生物、社會與技術層次，而各層次又可再細分為許多“次”層次（sublevels），如生物層次至少可再劃分為細胞、器官、有機體、族群、生態系、生物圈等等。（5）層次是物的“集合”，是人創造的概念，而不是具體物。見如Mario Bunge, *Method, Model, and Matter*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1973); Mario Bunge, *Philosophy in Crisis: The Need for Reconstruction*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01); Mario Bu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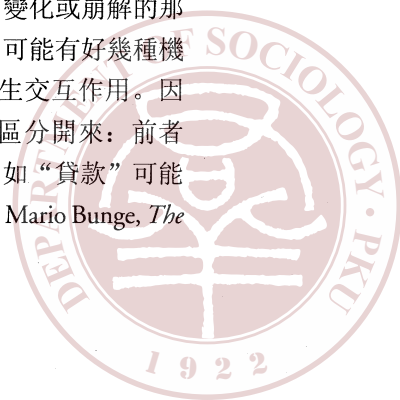


Emergence and Convergence: Qualitative Novelty and the Unity of Knowledg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3); Mario Bunge, *Matter and Mind: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New York: Springer,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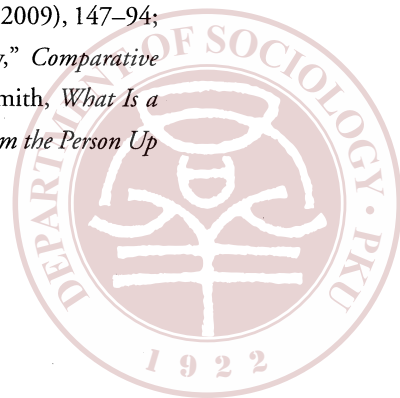
- 15 見 Fritz W. Scharpf, *Games Real Actors Play: Actor-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cy Research*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54; James Coleman,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1974); James Coleman, *The Asymmetric Society*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Jame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據此，我的立場在批判實在論者中是獨特的：(1) Bhaskar 及其追隨者多年來都認為“社會結構”具有因果作用力，但我和 Rom Harré 等人一樣反對這種說法，因為社會結構不是“實體”或“具有力量的特殊物”，而是“關係”；但我同時主張可以從更廣泛的“因果性”(causality)的角度(如亞里斯多德的四因說)來理解社會結構在社會世界中扮演的角色。見 Wan, Poe Yu-ze, *Reframing the Social: Emergentist Systemism and Social Theory*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2011), 125–38 的討論；另比較：Milja Kurki,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laiming Causal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Dave Elder-Vass, *The Causal Power of Social Struc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ve Elder-Vass, *The Realit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2) Harré 等人認為，在社會世界中，只有“人”是具有因果作用力的實體，但我則主張許多超個體的行動者(即這裡所謂的複合行動者)也可以滿足“具有力量的特殊物”的條件，我們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些行動者是具有(突現)因果作用力的實體(或 Bunge 所謂的具體系統)，見 Wan, Poe Yu-ze, “Analytical Sociology: A Bungean Appreciation,” *Science & Education*. Online First Version (2012). DOI: 10.1007/s11191-011-9427-3。
- 16 見 Dave Elder-Vass, *The Realit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7; Dave Elder-Vass, “Integrating Institutional, Relational and Embodied Structure: An Emergentist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9 (2008), 285。
- 17 黑格爾，《邏輯學》下卷，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99，中譯略有修改。
- 18 見 Richard Baron, *Deliberation and Reason* (Leicester: Matador, 2010), 256。
〈李文〉的標題雖然是“作為社會科學哲學的社會機制”，但卻未能充分認識到機制式解釋背後的科學哲學基礎。若要完整評價機制式解釋，是不可能不觸及“因果性”這個課題的。限於篇幅，本文亦無法深入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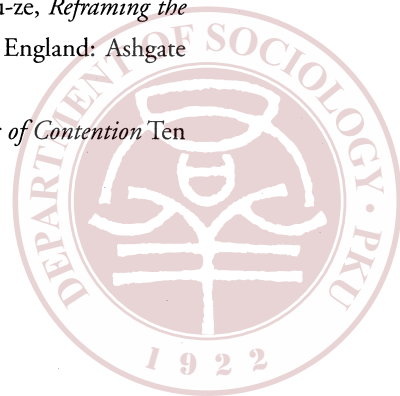
- 理“因果性”這個複雜的課題，但必須指出：機制式解釋所預設的，是實在論的因果觀，也就是Rom Harré所謂的生成 (generative) 式的因果理論，強調的是因果作用力與自然必然性 (natural necessity)，科學哲學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Rom Harré、E. H. Madden、Nancy Cartwright、John Dupré、George Molnar、Alexander Bird、Stephen Mumford、Brian Ellis等人；與之相對的，則是經驗主義傳統下的規律 (regularity) 或接續 (successionist) 式因果理論，主要代表人物是休謨及其當代的實證主義追隨者。更完整的討論見Wan, Poe Yu-ze, *Reframing the Social: Emergentist Systemism and Social Theory*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2011), 109–25。當然，思考因果性的方式絕不限這兩種，可參考其他著作的進一步分類整理，如Michael Esfeld,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Une introduction*. 2nd ed (Lausanne: Presses polytechniques et universitaires romandes, 2009); Christopher Hitchcock, “Causation,”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s. Stathis Psillos and Martin Cur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317–26; Henry E. Brady, “Causation and Explanation in Social Scienc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eds. Janet M. Box-Steffensmeier, 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7–70。
- 19 這個立場有時亦被稱作“因果實在論” (causal realism)。見如Daniel Little, *Microfoundations, Method, and Causation: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Federica Russo, *Causality and Causal Modell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easuring Variations*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 20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鬥爭的動力》，李義中、屈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30–31。另見Charles Tilly and Sidney Tarrow, 《抗爭政治》，李義中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36、265。
- 21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43。
- 22 見如Andreas Pickel, *The Problem of Order in the Global Ag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23 但不是所有的過程，而是使特定系統得以運作、存續、變化或崩解的那些關鍵的過程。此外，在同一個（或同一類）系統中，可能有好幾種機制（且可能是不同層次的機制）同時運作，且可能產生交互作用。因此，研究者應試圖將本質性的機制與非本質性的機制區分開來：前者為該系統所獨有，後者則可能出現在不同系統之中。（如“貸款”可能是銀行的本質性機制、製造商的非本質性機制。）見如Mario Bunge,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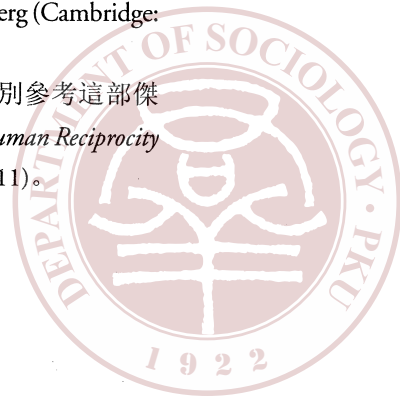
- Sociology-Philosophy Connect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9), 23–4; Mario Bunge, *Chasing Reality: Strife over Real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 131; Mario Bunge, “Soziale Mechanismen und mechanistische Erklärungen,” *Berliner Journal für Soziologie* 20 (2010), 376。
- 24 Mario Bunge, *Chasing Reality: Strife over Real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 128.
- 25 Mario Bunge, *The Sociology-Philosophy Connect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9), 24–5。
- 26 Paul Thagard 則略為修改了 Bunge 的 CESM 模型，提出他所謂的“環境—部分—相互聯繫—變化”(EPIC) 模型。見 Paul Thagard, *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Science: Explanation, Discovery, and Conceptu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2), 265ff。
- 27 請參考如 Mario Bunge, *The Sociology-Philosophy Connect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9), 27–33; Mario Bunge, 2006, *Chasing Reality: Strife over Real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 129–38; 另見 Rom Harré and Paul F. Secor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Oxford: Blackwell, 1972), 67–8, 71–3 對“想像力”的討論。
- 28 Tilly 自稱“關係實在論者”(relational realist)，主張“交換、互動、社會聯繫和對話構成了社會生活的核心成分”，見 Charles Tilly, *Stories,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hang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72。另請比較：Mustafa Emirbayer,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997), 281–317。
- 29 實證主義“將社會實在視為事件與事件之間因果關係的綜合體，並將這樣的因果關係描述為變項與變項之間的關係”，見 Norman Blaikie, *Approaches to Social Enquiry: Advancing Knowledge*. 2nd ed (Cambridge: Polity, 2007), 178。
- 30 因此，〈李文〉這段經驗主義式的說法是有問題的：“社會機制尋求發掘社會現象背後的可以驗證、可以觀測的事實，並構建它們之間的聯繫”(頁361)。請進一步參考如 Phillip Gorski, “Social ‘Mechanisms’ and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A Critical Realist Proposal,” in *Frontiers of Sociology*, eds. Peter Hedström and Björn Wittrock (Leiden: Brill, 2009), 147–94; George Steinmetz, “Critical Realism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 (1998), 170–86; Christian Smith, *What Is a Person?: Rethinking Humanity, Social Life, and the Moral Good from the Person U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 31 Chares Demetriou, "Processual Comparative Sociology: Building on the Approach of Charles Tilly," *Sociological Theory* 30 (2012), 55.
- 32 Peter Machamer, Lindley Darden, and Carl F. Craver, "Thinking about Mechanisms," *Philosophy of Science* 67 (2000), 3。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 Machamer 認為應該把“規律性”從這個定義中拿掉。見 Peter Machamer, "Activities and Causation: The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of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8 (2004), 37。
- 33 特別參考如 Carl F. Craver, *Explaining the Brain: Mechanisms and the Mosaic Unity of Neuro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Carl F. Craver, "Constitutive Explanatory Relevance,"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32 (2007), 3–20; Carl F. Craver, "When Mechanistic Models Explain," *Synthese* 153 (2006), 355–76; Robins, Sarah K. and Carl F. Craver, "Biological Clocks: Explaining with Models of Mechanism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and Neuroscience*, ed. John Bick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41–67。
- 34 Stuart Glennan, "Ephemeral Mechanisms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 *Erkenntnis* 72 (2010), 251–66。
- 35 Peter Hedström, *Dissecting the Social: On the Principles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另見 Peter Hedström and Petri Ylikoski, "Analytical Sociology,"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eds. Ian C. Jarvie and Jesus Zamora-Bonilla (London: SAGE, 2010), 389。
- 36 Gianluca Manzo, "Analytical Sociology and Its Cr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2010), 150。限於篇幅, 這裡僅簡短指出: 另兩位重要的機制論者 Daniel Little 和 Philip Gorski 對機制的看法亦可與這裡的討論產生共鳴。請參考如 Daniel Littl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Springer, 2010), 102; Daniel Little, "Causal Mechanisms in the Social Realm," in *Causality in the Sciences*, eds. Phyllis McKay Illari, Federica Russo, and Jon William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73–95; Phillip Gorski, "Social 'Mechanisms' and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A Critical Realist Proposal," in *Frontiers of Sociology*, eds. Peter Hedström and Björn Wittrock (Leiden: Brill, 2009), 147–94; Wan, Poe Yu-ze, *Reframing the Social: Emergentist Systemism and Social Theory*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2011), 147–8。
- 37 Doug McAdam and Sidney Tarrow, "Introduction: *Dynamics of Contention Ten Years On*," *Mobilization* 16 (2011), 4, 重點為我所加。



- 38 見如 Peter Hedström and Richard Swedberg, "Social Mechanisms," *Acta Sociologica* 39 (1996), 299; Peter Abell, Teppo Felin, and Nicolai Foss, "Building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Routines, Capabilities, and Performance Links,"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9 (2008), 489–502; Peter Abell, Teppo Felin, and Nicolai Foss, "Causal and Constitutive Relations, and the Squaring of Coleman's Diagram: Reply to Vromen," *Erkenntnis*, 73 (2010), 385–91。
- 39 見如 Peter Hedström and Petri Ylikoski, "Causal Mechanis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2010), 49–67; Peter Hedström and Petri Ylikoski, "Analytical Sociology,"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eds. Ian C. Jarvie and Jesus Zamora-Bonilla (London: SAGE, 2010), 386–98; Peter Hedström and Peter Bearman, "What Is Analytical Sociology All about? An Introductory Essa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eds. Peter Hedström and Peter Bear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24; Thomas Schwin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gency,"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eds. William Outhwaite and Stephen P. Turner (London: SAGE, 2008), 302–15。
- 40 這是 Bunge 的用語，一般稱爲“Coleman船”（因爲該圖式的形狀像一艘船）；Peter Abell 則稱之爲 Coleman-Lindenberg 圖式。
- 41 見如 Clemens Kroneberg, "Methodologie statt Ontologie. Das Makro-Mikro-Makro-Modell als einheitlicher Bezugsrahmen der akteurstheoretischen Soziologie," in *Das Mikro-Makro-Modell der soziologischen Erklärung. Zur Ontologie, Methodologie und Metatheorie eines Forschungsprogramms*, eds. Jens Greve, Annette Schnabel, and Rainer Schützeichel (Wiesbaden: VS Verlag, 2008), 357–71; Peter Hedström and Petri Ylikoski, "Causal Mechanis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2010), 49–67; Peter Hedström and Petri Ylikoski, "Analytical Sociology,"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eds. Ian C. Jarvie and Jesus Zamora-Bonilla (London: SAGE, 2010), 386–98; Peter Hedström and Richard Swedberg, "Social Mechanisms," *Acta Sociologica* 39 (1996), 281–308; Peter Hedström and Richard Swedberg, "Social Mechanisms: An Introductory Essay," in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eds. Peter Hedström and Richard Swedber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1。
- 42 “互惠人”的行動模型是我近來特別關注的主題。請特別參考這部傑作：Samua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A Cooperative Species: Human Reciprocity and Its 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43 見如Jon Elster, *Ulysses and the Sirens: 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Jon Elster, *Sour Grapes: Stud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Jon Elster,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Raymond Boudon, *Raison, bonnes raison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3); Raymond Boudon, *La rationalité*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9); Raymond Boudon, “Ordinary Rationality: The Core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in *Analyt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Mechanisms*, ed., Pierre Demeulenae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3–49; Raymond Boudon, “Beyo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2003), 1–21.
- 44 相關討論見如Lars Udehn,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Background, History, and Meaning* (London: Routledge, 2001), 96–9; Lars Udehn, “The Ontology of the Objects of Historiography,” in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d. A Tucker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1), 209–19; Pierpaolo Donati, *Relation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63–4.
- 45 見註14。
- 46 我對分析社會學者的回應請見Wan, Poe Yu-ze, “Analytical Sociology: A Bungean Appreciation,” *Science & Education*. Online First Version (2012). DOI: 10.1007/s11191-011-9427-3。我的立場可簡單概括如下：(1) 機制式解釋意謂闡明較低層次的某些細節（打開黑盒子、強化微觀基礎），因為機制涉及（宏觀）系統的（微觀）組成成分之間的關係與互動；(2) 雖然微觀基礎是重要的，但社會科學的因果解釋不一定需要指涉至個體行動者，因為複合行動者也是嚴格意義上的因果作用者；(3) 關於微觀基礎，我的立場傾向於某種微觀基礎的弱綱領（而非強綱領）：在社會科學的因果解釋中，當研究者主張某些社會實體具有因果作用力時，可以只是認知到或假定這樣的主張具有（以行動者及其行動為核心的）微觀基礎，但不必在一切因果解釋中都提供這樣的微觀基礎；(4) 超越個體的（宏觀）社會機制是存在的：雖然我們在認識論上可以解釋（或拆解）這些（由系統的組成成分互動而成的突現）過程，但本體論上這些過程仍然是實在的、真實的，就好比雖然我們可以將心血管系統內部的血液循環（機制）拆解為更小的單位，但血液循環的過程本身仍然是實在的、真實的。

